



汤一介集

第九卷

深夜一盏灯

——散文和随笔



汤一介集

第九卷

深夜一盏灯

——散文和随笔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汤一介集/汤一介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300-18397-8

I. ①汤… II. ①汤… III. ①汤一介-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2706 号

汤一介集

汤一介 著

Tang Yijie J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256 插页 51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 114 000	定 价	998.00 元 (全十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自序

白天，我或者写我的学术论文，或者构思一本打算写的著作，或者为讲课写一份必要的提纲，或者参加某个会议，或者接待来访，或者处理一些杂事，空闲的时间是很难有的。但当我忙碌了一天，每天晚上我常常喜欢放松一下，就打开录音机或者 CD 听听音乐。我喜欢听的是西方古典轻音乐，特别是小提琴演奏的小夜曲。在这种时候，我感到的是一种非常美妙的享受。但往往在听着听着的时候，我脑中会忽现一个又一个的遐想：想着我的青少年时代，想着我的父母和子女，想着培养我的大学，想着我阅读报刊时的感受，等等。时已深夜，静静的深夜，再无什么打扰了，只有音乐的旋律使我悠然自得。这样深夜一盏灯的时刻，常常会唤醒我将要入睡的意识，或者是可笑的，或者是思念的，或者是快乐的，或者是痛苦的，或者是愤怒的，或者是自责的，或者是感慨的，或者是感到羞耻的片断画面。这时，也许有点灵感，在深夜一盏灯下放好几张纸，提笔记下这些随想，在音乐声中为自己留下点滴痕迹。但近几年来，由于进入耄耋的老年，在睡觉前仍然保留着听音乐的习惯，但自由的遐想渐渐离我远去，思想不再那么活跃，在朦胧的睡意中，舒伯特的《圣母颂》引导我入睡了。

汤一介

2012 年 11 月 24 日

目 录

在进退两难之间

书香门第	3
功课平平常常	6
《国史大纲》与《哀江南赋》	9
我不是一个坚强的人	12
北京大学先修班	14
寻求通往真理的路	19
这就是生活，真实的生活	23
“引蛇出洞”的“阳谋”	26
迷惑的十年	29

我爱我家

读祖父雨三公文	35
我的父亲汤用彤	40
到云南与父亲团聚	46
西去延安幻想曲	55
父亲给我的三封信	59
从《东方之子》说起	63
记我的母亲	69

我们家的儒道互补	73
我的子孙成了美国人	76
东厂胡同大院中的大孩子和小孩子	80
我和邓可蕴	83

北大，我的精神家园

从沙滩到未名湖	95
我与北大	101
我为什么选择北大哲学系	105
北京大学有三个“宝”	109
谈谈硕博连读的好处	114
中国文化书院十年	118
现代社会中的书院	122

所感、所思、所忆杂录

为自己找个安身立命处	127
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130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132
——谈自我身心内外和谐之路径	
“会东西之学，成一家之言”	135
——为司马迁的话加上一句	
哲学要回答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138
超越旧我，开拓新我	140
——写在《文明》杂志创刊五周年	
“新轴心时代”的文化超越	144

国学教育和东西方文明	148
读书本该会意	150
我最喜爱的书	152
向青年推荐三本书	157
书中自有大智慧	160
可贵的是要有奉献精神	162
“真人”废名	164
悼念周一良先生	168
冯友兰先生《新原人》的“四种境界说”	171
记胡适给我父亲的一封信	175

需要有不同的声音

这个提法是不妥的	179
“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	181
昔不至今	183
不要把“五四运动”与“打倒孔家店”等同起来	186
关于“学术自由”的一点感想	188
“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191
自由的层次	193
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	197

文化随笔

理性看待全球化中的中西文化教育	203
小议“以德治国”	206

平等对话才能相互理解	208
知识分子与知识阶层	212
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	214
高行健的《灵山》	217
建设“和谐社会”要有“文化自觉”	219
当代知识分子角色与性格	221

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我是从哪里来的？	227
小妹到哪里去了？	229
人是不是能像花草一样再生？	231
我为什么而活？	235
人真能逍遥吗？	239
我真能相信宗教吗？	242
理想与现实必定是矛盾的吗？	255
超越生死的观念和途径	261

中国的“老天爷”

盘古开天辟地	269
女娲炼石补天	271
有意有义的“老天爷”	273
念天地之悠悠	276
“天体”为何？	279
天人之际	283

天有三意	286
“畏天命”与“知天命”	291
天人合一	293
几点启示	297

深夜一盏灯

在进退两难之间

书香门第

我的童年是在平静、平常、平淡的状况下度过的。1927年1月15日我生在天津，但我填写籍贯都填写我的祖籍湖北省黄梅县。是年，我父亲汤用彤（字锡予）正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授。我母亲张敬平是湖北省黄冈人，他们家是当地的大族，她的哥哥张大昕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后来做过汉阳兵工厂的督办之类。我这位舅舅是个藏书家，听母亲说他藏有两册《永乐大典》，本来要送给我父亲，但父亲没有接受。后来因一次大火，把他的书全部烧光了，如果我父亲当时接受了，那么现在世界上又可以多两册《永乐大典》了。听母亲说，在她怀着我的时候，有一次坐黄包车翻了车，手骨折断，但幸好把我保存了下来，否则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了。1928年，我父亲又回到南京中央大学教书。在我脑海里有着一个模糊的印象，我们在南京住的是有院子的平房，大门是黑色的，当然，这也可能是后来听我母亲说的，而无论如何，这是我最早的记忆。

我的家，从我祖父起大概可以算是所谓“书香门第”。在我出生时，我的祖父汤霖（号雨三）已经去世十五年，而祖母梁氏还健在，她是1938年八十五岁去世的。祖父是光绪十六年（1890）的进士，据1991年新修的《汤氏宗谱》记载：“霖，字崇道，号雨三，同治十一年（1872）洪宗师科试取入县第一名。光绪元年（1875）王宗师科试考取一等三名，补廪，梁宗师科试考取一等第二名，高宗师科试考取一等第三名，张宗师岁科试均考取一等第一名，光绪乙亥、己卯、戊子三科三膺房荐。己丑恩科中试举人。庚寅恩科会试联捷进士，官知县，晚号颐园老人。两次丁艰家居

授徒，成材甚众，歿后门人私谥元贞先生。”又另处载曾历任甘肃渭源、平番等县知县加同知衔，历充丁酉、壬寅、癸卯等科甘肃乡试同考官。我父亲几乎没有和我谈过我的祖父，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发生了“反右派斗争”后，使我产生一种悲观的情绪，感到知识分子总是很倒霉的。有一次，我问父亲关于祖父的情况，他只是说，我祖父喜汉《易》，但没留下什么著作，平日爱用湖北乡音吟诵庾信的《哀江南赋》和《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并且把他收藏的一幅祖父六十岁生日时学生们为他祝寿的《颐园老人生日燕游图》给我看，其中有我祖父的一段约五百字的题词，和他的学生为他祝寿的祝辞，最近我在《汤氏宗谱》中还看到祖父的一些诗文。

在辛亥革命前，我父亲曾在北京顺天学堂读书，同学有梁漱溟、张申府等，辛亥革命后上了清华学堂。1918年赴美国留学。1922年回国后一直在大学教书。1930年他应胡适之聘到北京大学做教授，以后一直没有离开北大，直到他1964年去世。他的为人、为学已有很多记载，钱穆伯父对他了解最深，在他写的《忆锡予》和《师友杂忆》中记载着他们之间的交往和深厚的友谊。

从小父亲就很少管他的孩子们，多半是母亲照顾我们。母亲可以说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我们的一切衣、食、住、行都由她操持，我不记得我挨过打。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九一八”事变时，由于怕日本人打到北平，我们一家曾到汉阳舅舅家避难。有一天我在楼道里跑着玩，吵闹了舅舅，他就要打我的“板子”（打手心），我母亲就是不让他打，并且说如果他打我，我们就搬到汉口的姨妈家去住，我舅舅只好作罢。那时我姨父是湖北省财政厅长，叫黎澍，也可能还是湖北银行行长，这我已记不清了。我母亲是他们家中最小的，我舅舅和姨妈一切事都将就她，而我姨妈自己没有孩子，因此也最疼爱我。

“九一八”后，北平平静下来，我们又回到北平。我家住在南池子缎库胡同，前门是三号，后门是六号，是一座很大的房子，共有三个院子，前院、正院和后院，中间还包括一座两层的小楼。这时我们和我伯父汤用彬一家住在正院里，伯父也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后院的房子出租，不走前门三号，而走后门六号。前院，钱穆伯父初来北平时住过一段时间，后来成为我父亲的书房和会客的地方，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就是在那里完成的。正院是个三面有房子的四合院，在两厢房和正房间都有走廊相连，正房的东北角有座两层小楼，楼下是个大厅，我和我妹妹还有堂弟妹常在里面滚铁环玩。楼上有三间房子，父亲的研究生王维诚、王森两位先生都在楼上住过，他们那时是我们的家庭教师。

父亲虽然不管我们，从来不问我们的功课如何，当然更不管我们的衣、食、住、行，但他还是很爱我们，特别喜欢我妹妹汤一平，可以说他对我们很慈祥。他常和熊十力、蒙文通、钱穆等先生到中山公园的春明馆或来今雨轩喝茶，总是带着我和妹妹。父辈们喝茶、吃点心、聊天，我和妹妹吃完了包子就到处去玩。从1932年起一直到1936年，每年暑假，我们一家和伯父一家都到庐山去避暑，因为我们家在庐山牯岭大林路有三栋小楼房，我们常常住中间一栋。在楼前有一块大石头，像只大蛤蟆，我们叫它蛤蟆石，常常爬上去玩。这段时间自然是我们这些孩子最快活的日子了。这些日子，父亲每日看书、写文章，现在收入他文集中的《大林书评》就是他在庐山上写的。这就是说，我的童年生活是很平静的。

原收入《在非有非无之间》，台北，正中书局，1995（本部分内容皆出自该书，不另注）

功课平平常常

我五岁开始上幼儿园，最初是在中南海边上的艺文学校的幼儿园，对这一段的事，我几乎什么也不记得了，只记得入园要换鞋。后来又转到孔德学校的幼儿园，因为它离我们家比较近。对在孔德小学的生活，我记得比较多，除了还要换鞋之外，现在还能唱出一两首当时学的歌。由于我比较内向，也不太合群，因此好朋友不多。我常和一姓苗的小女孩玩，听说她是苗可秀的女儿。我们俩常在滑梯的沙土坑里堆沙山，她说她是皇后，我是皇帝，当然当时我也不知道皇帝是什么样的人。既然她这样说，我也同意。在孔德我一直读到小学五年级，这时已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在孔德小学我的功课一直是中等，所以表现得很平常。在五年级时，我们增加了日文课，由日本人教，我们都很讨厌日文课，好像没有人好好学，别的功课我们都没有作过弊，但考日文，很多同学都把书坐在屁股底下，不时地拿出来抄，大作其弊。因此，我的日文虽然学了一年，但几乎什么也没有学到。由于不愿学日文，1939年我转到灯市口的育英小学六年级，因为它是教会学校，可以不学日文，而学英文。从小学二年级起，我就爱看《三侠剑》、《七侠五义》之类的武侠小说。先是，我家的一位车夫念给我听，我越听越上瘾，后来我自己看，当然半懂半不懂，可是那些剑侠的打斗很吸引我。

1939年底，我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弟弟，还有邓以蛰伯父的孩子邓仲先、邓稼先一起由天津乘船到上海英租界，然后去香港，又由香港转越南的海防上岸，在河内住了几天，乘车由滇越路到云南去。因为我父亲那时在西南联大教书。这就是说，我并没有

读完小学，因此也就没有拿到小学毕业证书。

1940年，我们全家在云南团聚了，但是我的哥哥汤一雄于1939年因在云南作盲肠切割手术，麻药中毒而去世。由于当时日本飞机常轰炸昆明，我们一家先住在离昆明不远的宜良县。这时住在宜良县的西南联大教授有好几位，有贺麟、郑昕、姚从吾、唐钺等。在此以前钱穆伯父也住过，不过这时他已离开西南联大到成都去了。宜良县是个风景秀丽、民风淳朴、有山有水、离著名的石林不远的小县。离县城五六里有一温泉，我父母常常带我和弟弟、妹妹一起到那儿去洗澡。这时我进了宜良县立中学初中一年级。当时学校的教员有一部分是西南联大在校生，他们来往于昆明与宜良之间，时常缺课，而我也不是一个用功的孩子，功课也就平平常常。

1941年夏，我们家搬到昆明，先是住在离昆明城约十里的小村——麦地村一座尼姑庵里。这时闻一多伯父一家住在附近的司家营，金岳霖、冯友兰住在附近的龙头村。我进了西南联大附中读书，它是当时昆明最好的中学。由于宜良中学的水平不行，我没有考取初中二年级，只得降到初中一年级重读。联大附中要住校，因此每星期六我就和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鹤、闻立雕，还有一位同住麦地村的云南同学殷承祐一起回家。在假期我们四人常在一起玩，记得有一年暑假，我们相约到山上去“探险”，爬上了很高的山，沿路还偷地里的白薯、老玉米烧来吃，最后我们还放火烧山，一直玩到天黑，当然家里的大人都很着急，回家后我们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责难。我在联大附中，功课也很平常，但体育不错，还是排球校队成员，这时冯钟芸老师教我们国文，其中有些诗词，我最喜欢的是李后主的词。这期间我开始看小说，先是看巴金的《家》、《春》、《秋》等，也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好像还看了屠格涅夫的《罗亭》和《父与子》。到初二下学期，比我高一年级的余绳荪（余冠英的儿子）弄到了一本斯

诺的《西行漫记》。于是我和余绳荪还有游宝谟（游国恩之子）、曾宪洛（曾昭抡之侄）、胡旭东在校外租了一间房子一起读。这本书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同时我们又都很讨厌童子军教官吴能定，我们就一起研究，决定干脆到延安去看看。对我来说，我当时完全不是出于对政治有什么认识，而是出于一种孩子的好奇心。于是在1943年春，我们几个人各自从家里偷了一些钱或黄金做路费，先乘火车到曲靖，由曲靖搭“黄鱼”到贵阳。到贵阳后，我们都很兴奋，就一起住在一家小旅馆中，登记时都用我们的真名。住下后，我们就到外面小馆子吃饭，可是一回来就有几个黑衣大汉在等着我们，要我们跟他们走一趟，并要把所有东西都带上。我们都感到大事不妙，但也无法，只好跟着去，一带就把我们带到贵阳警备司令部，并且住在侦缉队里面的一间小房子里。幸好他们没有先检查我们的东西，因为我们还带着那本《西行漫记》呢！如果被查出就大为麻烦了。恰好我们住的小房是木地板的，在两块木板之间有小缝，我们就把书一张一张地撕下，塞入地板缝中。第二天，警备司令部的一位参谋长之类的人找我们每个人谈话，首先当然是审问我们的头头余绳荪，接着一个一个问题。问我要到哪去，我说要去重庆读书，因为我有堂姊在重庆南开中学教书；又问我喜欢看什么书，我当然不会说我爱看《西行漫记》了，我说我喜欢李后主的词和巴金的小说等等。

又过了一两天，贵州省府秘书长郑道儒找我们一起“训话”，说什么“要好好念书”、“不要听信什么人的坏宣传”、“现在是抗日时期，要拥护党国和领袖”之类。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官僚的“训话”。大约在警备司令部关了一星期，联大附中的教务主任魏泽馨来贵阳，把我们接回昆明了。当然，联大附中我们不好再回去了，大都转到云大附中去了，而我在家待了一段时间就真的到重庆南开中学去念书了。